

基于格雷马斯理论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叙事结构分析

田星瀚,焦瀚

江南大学,无锡 214122

摘要:本文以深思当代国产电影中传统文化符号、神话故事IP与新时期大众情感化观影诉求的价值重构为目的,以格雷马斯行动模式中“欲望产生、行动能力、实现目标、得到奖赏”四段式作为研究方法,运用符号矩阵理论的“正反X”观点来划分影片中的人物归属以及产生的相关冲突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影片以“意义”为主诉求的叙事结构进行分析,以主人公“哪吒”为主要对象,总结得出影片内容与现实社会中“自我认可”、“他人认可”等诸多关系的隐喻性表达关联结论。《哪吒之魔童降世》虽在网上相关平台的观众评价中尚有不足,但就影片本身的叙事架构与票房数据来说,可以视为国产动画电影融入传统元素优质制作的一种全新创造性体验,为国产动画电影的叙事架构提供了借鉴意义。

关键词:符号矩阵;叙事结构;隐喻性表达

中图分类号:J21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19)01-0112-03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19.01.021

《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由霍尔果斯彩条屋影业有限公司出品、饺子(杨宇)编剧兼导演的动画电影,引爆了2019年暑期社交网络。在各大观影平台斩获高分好评,截至9月5日,国内票房已突破四十七亿元,打破了由《疯狂动物城》保持的动画电影票房记录,摘得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第一。故事以民间传统神话《哪吒》为灵感来源,在保留原有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颠覆了以前哪吒作为正面角色的形象,加入了对于“个人奋斗与社会认同”的思辨探讨,讲述了“魔丸所化,且在三岁必遭雷劫毁灭”设定的哪吒,从唱着打油诗与世人格格不入,到“逆天而行,斗争到底”,最终获得社会认可的故事。其中不屈服、不妥协、不信命的精神内核,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情感共鸣,是一部融合了传统、热血、亲情的优秀国产动画电影。

该剧的叙事结构建立在两个方面:叙事主旨和角色塑造,并成功地将当前社会关系中的诸多痛点进行总结并反映了出来。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个人

与社会的关系日益成为重要命题。从道德层面而言,这一问题集中地呈现为宏观视角下个人奋斗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对立矛盾,从而产生了在客观环境中“实现意义”的自证需求^[1]。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哪吒之魔童降世》电影的叙事主旨与角色的行为表现就不再是单纯的反抗,而是在进行对于自身“意义”问题的探究与实践解答。

1 符号模式下的冲突与隐喻关系

在以“意义”问题为研究出发点的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理论中,一段冲突故事的发生必然需要“X”与相对应冲突的“反X”,推动情节发展的新因素“非X”与“非反X”,最后通过四个因素的充分展开,构成一部影片的主要叙事结构^[2]。在两两对立的情况下,“X”和“非反X”、“反X”和“非X”都是互为补充、互为表里的关系。在《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影片中,最先出现的并非主人公“X”(哪吒)与“反X”(敖丙),而是必要的

收稿日期:2019-09-10

作者简介:田星瀚(1973—),男,山东人,江南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通信作者:焦瀚(1994—),男,山东人,江南大学硕士生,主攻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理论。



图1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哪吒之魔童降世》人物关系

情节因素“非X”与“非反X”，也就是太乙真人与申公豹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见图1。在这两者的矛盾中，首先是魔丸与灵丸被分化；其次是申公豹作梗将“魔丸”托生为哪吒、“灵丸”打入龙蛋化为敖丙。通过这样的叙事结构，可以将主要矛盾人物关系与其冲突的必然性都提前置入观众的印象中。

动画电影的实质是现实生活的转化与变形，以魔幻化的叙事、神明化的元素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物质改造为基础，给予观众假定性的陌生感^[3]。在此基础上，借助创造性的叙事方式实现了符号隐喻的可能。

首先，影片中并未出现绝对的正义与邪恶。角色性格是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每个角色皆非“完美”，全片贯穿着个人奋斗与社会认同之间的隐喻纠缠^[4]。影片中的人物也都有着特定的设定内涵：外形瘦高，身为兽族刻苦修炼却不被认可的申公豹；体态肥圆，悟性不高却深明大义的太乙真人；身为魔丸却沐浴父母关爱的哪吒；身为灵丸却生于炼狱龙宫，背负家族使命的敖丙。这都和选择与被选择，认可与被认可的主线戏剧矛盾相契合，是两代四者选择的差异伏笔。在隐喻善恶冲突符号上，相较于原有传统故事中建立在“利他”基础上的“善”的经验性判断，《哪吒之魔童降世》采用的更像是康德实践哲学中，不以该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为依据，而是更加强调自我意志的善良的说法。也正是这样的“个人意志”的转化，使得叙事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戏剧性。于是，无论是敖丙为振兴龙族而企图覆灭陈塘关，还是他长期蒙面在海边守护百姓平安，都是站在不同角度对于自我的认知定位与权衡他人利益的抉择。在最后，敖丙挺身而出，与哪吒同入雷劫，才是唯一一次自己作出的对于自我的突破；而哪吒在拯救父母，保护朋友的行为过程中，不再是选择完全地释放本性，转而通过“为自己立法”的自我服从，保留了意志自由，也就确定了叙事中必要的道德根基。这一设置，不仅让观众看到两组共四个冲突符号在个人意志与社会认同的“不确定”之间的选择，而且也将道德行为出于意志的自律这一答案作为四个人物情节的“必然”结局。

其次，符号不仅仅在于人物冲突关系，还体现在叙

事所必须的角色合理性塑造要求中。影片对传统文化认知的隐喻使用拿捏得非常得当：太乙真人使用四川方言这一符号特征，不仅增加了电影的视听趣味性，更是凸显了现实中在四川宜宾有其修仙洞邸的地源认知；剧中的守护兽造型采用了四川三星堆青铜器的样式和花纹；剧中角色饮用的器皿借鉴了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造型；殷夫人战甲上的怪兽造型借鉴了商周时期的饕餮纹……细节的处理在强化中式风格的同时，更是交代了故事发生在商朝末期的合理事实。在强化民族风格特征的同时，也为特定故事叙事的展开提供了场景保障。

2 行动模式下的叙事架构

格雷马斯所划分出的产生欲望、行动能力、实现目标与得到奖赏四阶段组合成了影片矛盾冲突点的严密逻辑关系。看似纷杂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剧情，主要讲述的就是基于生命意义认可这一问题上的自我选择与他人认同行为，有目的的被认可行为是推动情节的主要因素，实现目标与得到奖赏则是对于结局的解读和埋下后续发展的可能^[5]。

第一阶段：以自证为目标的欲望产生。作为“X”出现在叙事结构中的哪吒，其“魔丸”的转生设定，让“恶”的定义以群众视角为途径，紧紧地贴在角色身上。而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获得自我的证明，自然也就成为了哪吒行动的主要诉求。假设将“流泪”这一情感宣泄方式作为特定行为，剧中哪吒的数次“流泪”，无一不是建立在“被认知”与“肯定”的情绪之上，这种群体标签与内心诉求的差异成了哪吒前期行为的依据与“逆反”的导火索。哪吒的欲望是有目的性和利益性的，人物的恶作剧与“除妖”行为，都是建立在自身行为逻辑与他人行为逻辑达成“被认可”诉求的基础上的，也正是因为这些主观行为受阻，所以才使得反抗与戏剧冲突更加合情合理。

第二阶段：行动能力。这一部分在叙事结构中表现为哪吒获得主要能力的过程，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由作为补充的“非X”太乙真人赋予。其一，以乾坤圈为途径，将哪吒的魔性加以限制，为其“善”的人性呈现埋下了必要的伏笔；其二，将其带入山河社稷图中加以修炼，在传授法术的过程中，将哪吒一味进行恶作剧的反叛行为，转化出了真正具有进行“善与恶”选择的可能性；其三，在生辰宴上，混天绫、火尖枪、风火轮的赐予，将哪吒的行为选择完全推向了自主行为，而不再是被动约束。这三个情节环环相扣，为哪吒最后的“向

善”与“抗争”作了合情合理的铺垫与展开。可以说,尽管作为“非X”的太乙真人起到了教化的作用,但不同于原有的继承与接受,本片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层层递进地描绘了哪吒选择能力的强化,以至于得到自由,也构成了最后能够击败敖丙,作出自己“善恶”决断的行动可能性。

第三阶段:实现目标。在叙事结构里,实现目标意味着需要具有一定的行动能力与客观事件来促使人物改变其现有状态。在“目标”的实现上,哪吒的行为所传达出的目标就是获得“认可”这一诉求,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善”的有效传达。在情节中,作为“反X”的敖丙的出现恰好是行为对照,其第一次出现,是在哪吒获得“群众认可”时,转化了哪吒孤独与缺乏信任的状态,也为后续情节发展埋下伏笔,但关键在于与主角想要获得“为他”行为认可所不同的是,敖丙所努力想要获得的,实际上是龙族“为己”的行为认可。在这样的差异下,矛盾最后在冰穹上爆发开来,也直接促使哪吒的命运从报复的“恶”,转变为自主选择的“善”。这两次转变,都决定着目标实现的转化,对从获得他人认可到作出自己的“善恶”选择的角色发展至关重要。

第四阶段:得到奖赏。哪吒最后获得的奖赏,是多视角的,也是多种方面下的结局。首先,对于角色视角和情节方面来说,保存元神渡过雷劫,得到了百姓真正意义上的认可就是最为直接的“行动奖赏”,但更进一步看,通过最后的“自我解放”,获得了善恶选择的可能性,才是哪吒真正意义上作为一个被接受个体的证明。其次,作为一部电影来说,从整体视角与IP延展性方面来看,“奖赏”的出现,不仅仅是对于结局的交代,更是可以引发故事的延续。在电影中,身为妖族的申公豹一心想成为“十二金仙”的行为与龙王企图脱离深海炼狱上升天界的行为,都未得到满足,当然也为

后续内容留下了可展开的空白。而最后,站在观众视角来说,“奖赏”的获得不再是单纯对故事结果的了然,更是在“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号召下,达成了对于现实生活中获得社会认同的“同情”共鸣。

3 结语

《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对于“意义”问题的选定上,引起了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观众的情感共鸣。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的层层内容,都可以在影片的叙事结构设置中找到其存在。在对于“人生起点的地位固然很难改变,但是通过个人不懈奋斗,人生的地位会不断提高和被社会肯定”这一核心问题,即“意义”的实现与自证上,借由欲望产生、行动能力、实现目标、得到奖赏四个阶段展开叙述。从包含行为模式在内的细节刻画引申而出的个人奋斗和社会认同隐喻性表达,都为电影营造出了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观影效果。总体来说,结合本土化的创作在提升影片质量和关注度的同时,能使叙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为国产动画电影的叙事结构搭建与隐喻性表达关联提供了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米高峰,张秦苗. 商业美学语境下的国产动画电影类型化叙事[J]. 电影文学,2015(2):82-84.
- [2] AJ·格雷马斯. 论意义[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 [3] 彭吉象. 影视美学(修订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4] 张瑾,郭学文. 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叙事学分析[J]. 电影文学,2018(2):103-105.
- [5] 罗钢. 叙事学导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